



大草原的变迁

马戎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敕勒歌》所描述的我国北方草原的景观，它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不知呼唤起多少幼小心灵对于茫茫草原的幻想。而历史上关于那些生活在这片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的民间传奇，通过“苏武牧羊”、“昭君出塞”、“木兰从军”和成吉思汗的故事深深地根植于亿万民众之中。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先后有近5千名北京中学生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牧区公社插队落户。作为北京最早一批自愿报名下乡的知识青年，在他们选择插队地点的时候，无疑有不少人是带着少年时代对于草原的憧憬而报名的。当运载知识青年的卡车车队奔驰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他们的心中浮现的就是《敕勒歌》的词句，草原深处错落有致地散布着白色的蒙古包，牧民们骑着骏马追逐车队表示欢迎，抑扬高昂的歌声撼动了我们的心灵。在当时的消费水准条件下，照相机是十分奢侈的物品，在与我们同乘卡车上的20几个人中，谁也没有照相机，回想起来非常遗憾，我们没有能够通过照相留下自己心目中对于草原的最初印象。

我们插队的地点是位于锡盟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最北部的一个大队，对于来自北京城的学生们来说，牧区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在放牧牛羊群、羊群的一年四季中，我们向牧民们学习接羔、剪毛、抓膘、配种等各项牧业劳动的知识与技能，对本大队那片方圆几百里的草场、水源、道路、山丘、



图 1

沟壑逐渐熟悉起来，负责放牧羊群的膘情也得到牧民的称赞。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在草原上生活的各种技能，一年四季住在蒙古包里，随着季节和草场的变化不断迁徙，随着时令更换厚薄不同的蒙古袍，学会的蒙古语带着锡盟口音，马具是自己修理，骑的马和拉车的牛由自己来驯服，自己做奶制品、缝蒙古靴，骑在马上也像蒙古人那样晃来晃去，有的还锻炼出可观的酒量，……这些北京的青年可以说已经被草原的蒙古游牧文化熏染同化，“牧区知青”也成为他们终生相互认同、与蒙古牧民认同的充满甘甜苦辣的身份象征。

在牧区羊群放牧和下夜工作中，通常有两个家庭通力合作，羊群夜间就卧在这两个蒙古包中间，这使得知识青年与一些蒙古牧民家庭结成相对稳定的“邻居”关系，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照片，是属于一个“知识青年包”的北京知识青年与同住的牧民家庭的合影。这是一个三代之家，中排的中间是户主的父母，两侧是户主夫妇，前面是他们的孩子，后排是4名知识青年。此时已进入冬季，户主和两个男孩子穿上了新缝制的翻面羊皮袍，头戴皮帽。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当是1970年或1971年，一名知识青年的胸前还佩戴着一枚闪闪发亮的毛主席像章（图1）。

在70年代初期，政府号召牧区发展农业，希望达到粮食自给，所以各个大队在有水源和平坦的地带建立了本队的“农业基地”，开垦草原种植粮食，由于世代骑马放

牧区知青”也成为他们终生相互认同、与蒙古牧民认同的充满甘甜苦辣的身份象征。



图 2



图 3





牧的蒙古牧民不习惯种地，知识青年和少数外来农业移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开发和维持“农业基地”的主要劳力。第二张照片就是几名知识青年在大队农业基地的土坯房前面的合影，穿短衣的是在农业基地劳动的知识青年，穿蒙古袍的3人是在附近放羊而路过此地的知识青年(图2)。

由于本地无霜期短、夏季干旱，庄稼无法成熟，把草地表面的多年生牧草翻耕破坏以后，下层的沙土露出地面，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沙化。所以到了70年代中期，牧区的农业开垦就因各种因素而停止了。草原的生态系统有其自己的规则，人们如破坏了这些规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牧业劳动与农业劳动不同，畜群实际上是由各户负责经营管理的，但是一些季节性的必须集中突击完成的劳动环节，则由小组组织集体协作完成，如在剪毛季节，需要把邻近几户的劳力集中在一起，各户的羊群按不同时间，赶进棚圈，大家共同为羊群剪毛。第3张照片就是在棚圈中集体剪毛的场景。面对我们的是两个正在剪羊毛的知识青年，背对着的是正在剪毛的两名牧民妇女，还有两人正在羊群中挑选应当剪毛的绵羊(图3)。这三张70年代初期拍摄的黑白照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时草原上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情况。

北京的知识青年到了7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返城，我们大队知识青年在女营原插队时间最长的大约有11年。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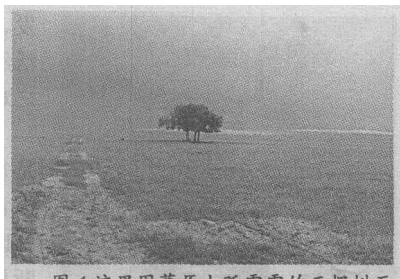


图4 这里因草原上孤零零的三棵树而得名，20多年过去，三棵树还是依然挺立在这里。

在了这辽阔的大草原，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沟都记载了他们的理想，凝集着他们的心血，有的知青甚至永远安葬在草原上。当他们离开了这茫茫无边的草原和那些淳朴善良、曾经把他们当作自己孩子那样关心照顾的蒙古牧民们之后，无论他们后来从事什么职业，无论时光的流逝如何染白了他们的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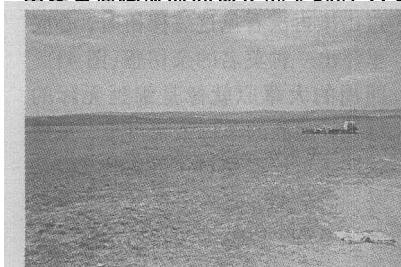


图5 草原就像无际的绿毯，远处的羊群依稀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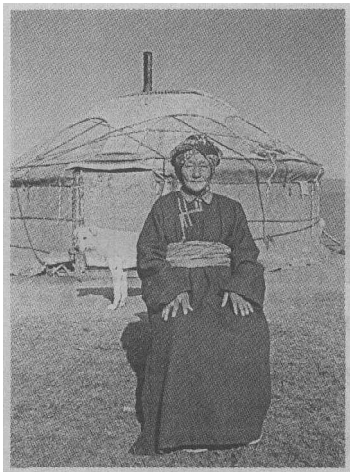


图6:蒙古包前的家族老人

的其他地区一样,大草原也发生了许多令他们惊奇和欣喜的变化。我们在1992年和1993年的夏季先后返回了当年插队的草原社区,拍摄了一些照片,在这里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这里的变迁。

当年在大队营盘附近谷地中长着3棵孤零零的榆树,老远就能看到,那里的地名也因此被叫做“三棵树”。当我们在20多年后翻



图8:原来的副大队长一家。

发,他们都无法忘却草原上的这段生活经历,这成为他们终生萦挂于怀、挥之难去的“草原情结”。

岁月如梭,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每年夏季总会有一些当年的北京知识青年,成队结伴地返回当年插队的社区,有时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不断地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当年的生活,他们要再看一眼那熟悉的茫茫草原、再见一面曾经照顾过他们的牧民老人,再一次置身于这广阔的天地之间,唱一首当年他们曾经唱过的、寄予生命理想的歌。

自从他们离开草原之后,像祖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大草原也发生了许多令他们惊奇和欣喜的变化。我们在



图7:一个牧民与河南来的包工队正在修建的房前合影。

过山梁再次看见这三棵树时,心底里浮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图4)。四周的大草原就像是绵延无际的绿毯,远处的羊群依稀可见,虽然这些羊群已经更替了许多代,但是看到它们时,似乎还是当年朝夕相伴的羊群,以熟悉的弧形结队,边吃边走,慢慢地行进在草原上(图5)。大草原仍然是这样地美。



由于造价昂贵、保暖效果不好,蒙古包在其他地区已经逐渐消失,但在这个最北部的草原地区,蒙古包仍然是牧民夏季放牧时不可缺少的,这个蒙古族老人安祥地坐在自家的蒙古包前,她养的白狗在包旁漫步,这个场景再次唤起了我们对以往牧区生活的回忆(图6)。



图6: 牧家的蒙古包

但是牧民们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新近建造的砖瓦房里。80年代初这里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牲畜分配到各户,放牧草场在社区成员协商下也分配给各户,地点固定下来了,同时由于市场流通推动了畜产品价格提高,牧民的收入也显著增加了,于是他们便开始请旗里甚至南方来的包工队为自己建造房屋,图7是1个牧民和他聘请的来自河南农村的包工队成员,后面是他正在修建的新房。这样的房子,根据面积大小,造价大约为3万到5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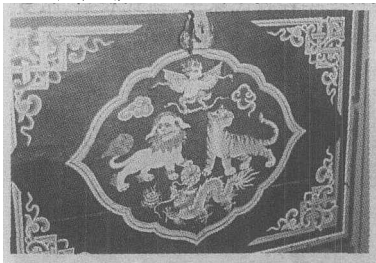


图10 老式箱柜上绘的传统图案

我们访问了许多当年熟识的牧民,图8是当年的副大队长一家在新房前的合影,这是90年代的三代之家,老人们穿着传统的袍子,年轻一代有的穿着方便的夹克,有一个孩子穿着新做的蒙古袍,其他3个穿着买来的短衣,这些成衣在旗里(县城)很容易买到,既便宜又方便。

住进了砖瓦房之后,内部空间的安排和摆设的家具必然与蒙古包很不相同,房内有砖砌的火炕,冬天很保暖,带有大穿衣镜的组合柜也成了常用的家具(图9),组合柜、沙发这些与房屋配套的



图11 牧民家中张贴的内地年画、对联



图 12 牧民家中的摆设

家具都是从县城买来的，牧民们反映它们既适用又漂亮。除了南方式样的家具外，许多牧民还添置了绘有传统图案的老式箱柜，如图 10 拍摄的箱子上绘的既有汉族的龙、虎，也有反映藏传佛教的白狮和护法大鹏鸟。

有的牧民家里墙上贴着买来的汉族传统的年画和对联(图 11)，虽然他们大多不懂汉语，但觉得这样的年画很漂亮，内地的文化习俗就是这样渐渐地渗入到草原牧民的生活当中。在一些年轻牧民家中，新式衣架、席梦思床和绘着旧式图案的箱柜等交错在一起(图 12)，表现出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俗的组合。

由于蒙古族几千年居住在蒙古包里，对蒙古包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有的牧民建砖瓦房时，特别要求建成圆形斜顶的蒙古包形状(图 13)，内部的格局摆设完全保持了蒙古包的传统，前面加盖一个汉式砖房作为门厅，这是汉蒙合璧建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图 13 蒙古包形状的砖瓦房

我们在访问过程中，见到了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走外蒙古的老喇嘛，他在外蒙古的一个集体农庄生活了 20 年，1988 年申请回来定居，现与他的侄子一家同住，并被重新接纳为社区成员。图 14 就是这位老喇嘛与侄儿一家的合影，他右手拿着的彩绘鼻烟壶，是他最心爱的东西。蒙古族传统的宗教是藏传佛教，而且信仰班禅大师，我们在这位老喇嘛家中，看到箱子上供奉的班禅大师相片和小型藏式唐卡，它们聚合在一起，与背后侄子所获的奖状相互辉映(图 15)。



图 14 从外蒙古回国定居的老喇嘛与侄儿一家

由于适值夏季，有些羊的后腿





和尾巴容易磨破生蛆，牧民需要经常检查上药，图 16 是牧民在棚圈里为病羊上药的情景，在操作上与 30 年前的情况完全一样。在大队草场的中心地区，大队还集中修建了供全社区使用的牲畜药浴池（图 17），在春秋两季，把马、牛、羊按群进行药浴，防治皮肤病和寄生虫。



图 16 牧民家中供奉的班禅大师像与唐卡

牧民的住房和生活用具有了很大变化，家家都有录音机，多数家庭有摩托车，有许多家庭买了吉普车。由于没有电，有的家还购买了柴油发电机，可用于晚上照明，但功率无法带动彩色电视机。我们发现牧民使用的鞍具与以前相比也无变化，但是蒙古袍的用料和装饰可比以前讲究了许多（图 18），这从前面图 8、图 14 等相片中也可看出。在苏木（相当于内地的乡，体制改革以前的公社）文化站，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本地蒙古族服装的展室（图 19），颜色鲜艳，做工细致，许多式样是我们当年插队时从未见过的，近年来人们富裕了，服装上也就开始讲究起来。



在 80 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承包制以后，大队不存在集体性劳动，原来大队中的汉族移民也离开了大队，其中多数迁到旗里（县城），但是户口仍然在大队。其中有一部分人购买了拖拉机等设备，常年来往于大队和旗里，流动销售各种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畜产品，由于苏木至今不通班车，交通不便，这些个体户对于促进当地的商品流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图 20 中就是由原大队外来户驾驶的一台拖拉机，拖车前部是糖、酒、洗衣粉等日用品，后部是从牧民家收购的羊毛等畜产品。在这种交易中所获得的赢利，就是他们养家活



图 17 苏木的药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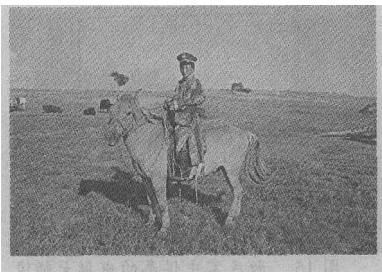


图 18 骑马的牧民孩子
耗时长,损耗大,从东乌珠穆沁旗赶一群羊到张家口,一般需要 20 天以上,途中常有风雨,羊只生病死亡也在所难免。现在卡车运输,当天就可到达,实在是方便多了。

当我们从大队(现称“嘎查”)回到公社(现称“苏木”)时,发现在这 30 多年里,这个居民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人口也没有增加,原来的土路两侧,稀稀拉拉的建了一些房子(图 22),从使用的建材方面看,质量有一定改善,基本上是砖瓦结构,但是作为基层政府所在地而言,它所发挥的主要还是行政和管理意义上的功能,有政府办公室、邮电所、信用社、粮站、小学、招待所、兽医站、文化站等,这些机构在 30 年前就具备,只是房子翻新,换了一批新人。唯一不同的是增加了 3—4 家个体饭馆,牧民们来这里办事、送孩子上学可以在那里吃饭,比原来方便了许多。



图 20 流动售货、收购的拖拉机

口的收入来源。

羊毛、山羊绒等产品可以经过小商贩的活动得到流通,但是大批牲畜的集中外运则需要长途卡车,图 21 中就是一辆长途运载活羊的卡车。在 30 年前,由于卡车缺乏,道路不通,锡盟北部旗县活畜输出的方式是成群赶放,边放牧,边赶路,



图 19 艺术文化站中陈列的本地蒙古族衣、袍式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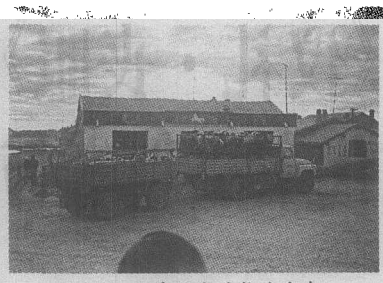
从我们几次回大队的感受来看,基层的牧民生活条件变化很大,旗里(县城)的基础设施与建筑变化很大,但是作为中间环节的苏木(乡)的设施功能,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牧民与外界的商业市场流通,基本上不经过苏木这个环节,而是由旗里和外地来的商人直接开车到草原牧民家中进行交易。所以





从物资交流贸易的角度来看，比起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社机构所发挥的作用，苏木这一级发挥的作用是明显下降了。

30 多年过去，辽阔的大草原依然还是茫茫无际，人们从游牧逐渐转为半定居，牧民们对自己承包的放牧场的经营十分关注，自己投资兴建了草库仓，而且有意识地减少



载畜量，本地的草场特别是沙丘地区的生态植被，比起 30 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善。时隔多年，但是在我们看来，草原牧民们的笑容还是那么淳朴，他们烧的奶茶也依然是那么香甜，大草原在变化，但对于当年的北京知识青年来说，那里永远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政府所在地，20 年无大变。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 书讯 ·

尧舜传说研究

陈泳超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8 月出版

33 万字 25.00 元

田野的风——民俗学论文集

邱国珍 赖施虬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出版

15 万字 20.00 元